

徐剑飞 著

鄞州佛教文化

周巍峙
题

宁波天童寺始于晋时自宋元以下
为临派宗室坐道场山林之胜地为
希有殿久棟宇弛壞以次修繕昨法
寺一區為清嘉慶中即建時以正材
難致鄞構楓松漸被蠹蝕迄今一百
餘載棟柱悉空而上堂殿宇者亦衰
倡者集會常以千數每惟檢棟傾圮
危在慮外求道者耶不為能令投巖
剎內有竹甘之山乃由甘誓殿非可
換以責人寺之中心禪定兩上人奉
講之暇期在更新以基宇宏宏特老
甘資為是善法種福果夙願陳列
簿籍以便記前而為禪者甘說

宁波出版社



徐剑飞 著

鄞州佛教文化

周巍峙
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鄞州佛教文化/徐剑飞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743-395-8

I. 鄞… II. 徐… III. 佛教-宗教文化-宁波市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551 号

鄞州佛教文化

作 者: 徐剑飞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80743-395-8

定 价: 30.00 元

序

傅璇琮

徐剑飞同志撰写的这本《鄞州佛教文化》，从鄞州佛教的发端写到近现代，将近20万字，时间跨度1700多年，经历的朝代有两晋、隋唐、宋元、明清和近现代，几乎概括了鄞州佛教发展的全部历史，是目前为止记述鄞州佛教最为详细的一部专著，为此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为了避免大多数佛教著述艰涩难懂的通病，利用曾经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优势，用散文的笔调来写佛教文化的历史，通篇文笔机智，幽默风趣，可读性很强。正如前辈学者曹厚德先生在翻阅此稿后，特在文稿的扉页上赞云：“史料详实，行文流畅，百读不厌，传世之作。”曾经编写过《鄞县志》的金儒宗先生也曾通阅全稿，认为“文学笔法浓郁，许多地方用词很诙谐，很有趣，可读性强”，“可能与作者过去写过小说、散文有关”。

我也有同感。我觉得这部著作在整体结构与行文风格上确有此特色，因此我趁撰序时机介绍作者的写作行迹与成果，供读者更便于赏识、鉴读此书。自去夏起，我与鄞州区文联合作，参与《三字经》修订版的编纂工作（此书后于2008年4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代表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鄞州区文联共同建立“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参与王应麟著作集成的编纂。正因此，我与鄞州区文联接触较多，今就我所了解，特向读者介绍徐剑飞同志的写作行迹。

徐剑飞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曾经当过乡镇干部和县级机关的秘书。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鄞县编修县志时,被抽调到县志办当编辑,是县志办唯一的女编辑。五年后县志编纂完毕,与县志办的同事一起创办《鄞县日报》,也就是现在的《鄞州日报》。她在报社先是当记者,当时《鄞县日报》许多有分量的通讯和特写等体裁的文章都是她的手笔。后来当记者部主任,再后来担任鄞县日报分管新闻业务的副总编。前几年就调到鄞州区文联任副主席。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开始实施阶段,文学创作的热潮在中国普遍掀起。20刚出头的徐剑飞同志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这个行列的。她一开始便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个文学门类,处女作在当时的《鄞县文艺》上发表,第二篇小说又马上刊登于省级刊物《东海》上,而且获得了1981年宁波地区唯一的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后又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东西,如果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新闻稿和偶尔付诸报刊杂志的生活散文排除在外的话,差不多有将近廿年时间没动过笔了。

四五年前,徐剑飞同志从节奏快捷的报社调到文联机关工作,后者相对悠闲的工作环境再次激发了她的写作热情,其间她写了十几篇读书笔记和地域文化散文,其中《韩岭:一个神奇的村庄》和《大嵩滨海平原垦拓史》两篇文章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宁波晚报》的“三江人文讲坛”上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地域文化的写作便成了徐剑飞同志重新执笔后选定的目标。作为地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徐剑飞同志大约有感于既历史悠久,又博大精深,即于两年前涉足于此,这应该也是鄞州佛教研究难得的机缘。

我通阅《鄞州佛教文化》,感到此书有两大特色。第一特色是不限于佛教教义与宗派迁变,而着眼于文化阐释,并就鄞州区的特殊地域文化背景,探索佛教文化与宁波浙东文化交融一起,互相依存与发展,成为宁波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国范围来看,鄞州佛教发端的时间不是特别早,开先

河的阿育王寺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天童禅寺是在18年后的西晋永康元年(300)开山的,而当时西晋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仅洛阳和长安两地就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多人。这虽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全信,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自《三藏记集》卷十三)。之前的三国时期浙东地区已有寺院十余所,其中普济寺、五磊寺和吉祥寺即属现在的宁波。但除了五磊寺已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重建外,其余两所早已废圮,不过五磊寺现有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如鄞州的天童和阿育王两寺。虽然鄞州佛教发端历史不是最早,但到目前为止,宁波地区最有影响的两大寺院都在鄞州境内,那就是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如果追溯一下历史,七塔寺、延庆寺、观宗讲寺等许多名刹,历史上均属鄞县范围,都为谱写鄞州佛教曾经有过的辉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名寺大德相互辉映,这是规律。鄞州几大寺院能够历经千年风雨的洗涤,依然耸立在这方土地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繁荣,愈来愈有价值,这与历代高僧大德悉心弘扬传承是分不开的。百丈怀海、四明知礼、宏智正觉、大慧宗杲、大觉怀琏、长翁如净、密云圆悟、木陈道忞、寄禅敬安、谛闲、圆瑛……每一位都是中国佛教史上重量级的人物。特别是近代,鄞州又成为中国佛教中心之一。天童寺方丈寄禅敬安于民国初期的1912年被推举为新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他又是著名诗人,作有1900多首诗,后人评价其成就在唐代著名诗僧寒山、皎然之上。圆瑛后来也以天童寺方丈的身份于1929年当选为中国佛教会首任主席,在职期间创设有开元慈儿院、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等慈善机构。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详细记述鄞州佛教文化对外活跃交流。鄞州地处滨海之地,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口岸,极为发达的佛教文化也由此成为对外文化邦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我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和朝鲜半岛等的佛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为吸收优秀的中国文化,不断派遣唐使入唐。遣唐使走南北两路,南路的到达点为苏州、扬州、明州、楚州等接近长江口的地区。日僧大多搭乘遣唐使船舶和唐商船从明州入唐,入唐日僧的最大目的在于求法,他们一到唐土,历访高僧,学习新教,力求带回新的法门回日本传播。唐代

的佛教中心在长安,日本使团往来长安的交通航路,在明州港上下岸要比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港或莱州港进出距离为近,又可利用大运河水运。这使明州成了日僧入唐和返日的落脚点,并使唐鄞县的佛教与日僧有了接触交流的机会。与此同时,不少唐代僧人转道明州往海外弘法,比如大名鼎鼎的鉴真和尚。在这一过程中,鄞州佛教也开始对外传播。

这样的交流和接触到了宋代达到了鼎盛。宋高宗时,为了管辖海外贸易,在秀州华亭县(今松江)设市舶司,统辖临安(杭州)、庆元(明州)、温州、秀州和江阴军五个市舶司。到庆元元年,(1195)其余4个市舶司先后撤销,只保留了明州一处,明州由此成为中日往来的唯一港口。当时入宋日僧大多为参禅求法而来,而禅宗名刹几乎全集中在江南地区。“天下禅宗五山十刹”中的鄞县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便成为入宋日僧最先熟悉和最早住过的禅院。据《天童寺志》、《育王山志》、《鄞县宗教志》记载,两宋期间,来鄞参禅求法的日僧共计22批次,鄞县僧人应邀赴日弘法8批次至多,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盛事可谓频繁。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扩大了鄞州佛教在海外的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宁波浙东地区与海外诸国其他文化与经济的交流。

我虽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但对佛教史未有深入、具体研究;我虽与王应麟同为鄞州五乡人,从小在宁波长大,父母对佛教甚为信仰,但我对鄞州佛教传播、发展也并不熟悉。这次遵嘱为本书作序,连续读了两遍,甚受教益,也对宁波文化的底蕴深厚益增缅怀之情。谨作此短序,就教于我们宁波同乡。

2008年冬,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作者原为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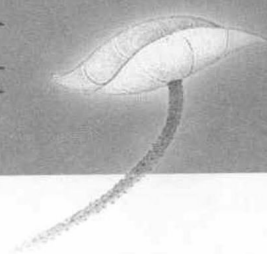
序言	傅璇琮
第一章 漫说两晋南北朝佛教	1
1.古鄞山惊现舍利宝塔	10
2.慧达与刘萨诃	19
3.青山捧出梵王宫	25
第二章 漫说隋唐佛教	37
4.金峨古刹	45
5.百丈怀海与金峨寺	51
6.梅子熟了	58
7.心如明镜	64
8.高丽僧人义通	69
9.鉴真与阿育王寺	74
10.最澄与子麟	79
11.蒋摩诃与弥陀寺	84
12.四明山心杖锡寺	90
第三章 漫说宋元佛教	97
13.四明知礼与天台山家派	106
14.宏智正觉与默照禅	113
15.大慧宗杲与看话禅	121



16.长翁如净与日本曹洞宗	127
17.大觉怀琏与育王宸奎阁	134
18.佛照德光与阿育王寺	140
19.无准师范与日本临济宗	146
20.从无学祖元说开去	152
21.补陀洞天霞屿寺	160
22.福泉山下大慈寺	165
23.铁佛寺与文武两王	171
24.广德庵与广德湖的故事	177
 第四章 漫说明清佛教	 181
25.法门龙象密云圆悟	188
26.木陈道忞与顺治皇帝	194
27.爱国诗僧寄禅敬安	202
28.日僧雪舟与天童第一座	211
 第五章 漫说近代佛教	 217
29.艰难的政教并进之路	225
30.观宗学舍与民国佛教教育	230
31.谛闲与天台教观	235
32.禅净双修的宏悟圆瑛	241
 后记	 248



第一章



漫说两晋南北朝佛教





楔子一

1.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印度，在阿育王时代开始走出国门向外传播，后来大约是在公元前 2 世纪时沿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域各国，由西域再往东，佛教文明就开始与中华文明接轨了。

关于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六到十种说法，但一般的看法或者说得到一般的承认和崇信的，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据《四十二章经·序》说，汉明帝刘庄在某个夜里梦见一个躯体高大、脚踩金座、头顶光环的金色天神。刘庄很奇怪，第二天早朝时就向群臣询问梦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文武百官面面相觑，都说不知道，这时有个叫傅毅的博学之士出班奏道：“臣听说天竺那边出现了一位大神，名叫佛陀，他可知前生来世。”

汉明帝把这话牢记在心，不久就派遣使臣去西域求取佛法。这些使臣走到大月氏，也就是现在阿富汗的一家客栈里碰到了两位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交谈以后，估计也是稀里糊涂的并不十分清晰明白，先把两人带到洛阳再说，同时带来的还有佛像和经卷。

这样一个大教用这样的方式在华夏大地上安家落户了，并从此开始它的漫漫征程。这两位印度僧人到洛阳后受到了汉明帝的热情接待，先是让他们住鸿胪寺也就是专门的外宾招待所，后来干脆造了座大房子送给他们讲学，由于他们携带的佛像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所以这座房子就取名为“白马寺”，洛阳白马寺由此而成为中华第一寺。

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汉代总体来说是 个崇儒的社会，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已成为华夏民族文化里的



重要部分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里,汉末以后老庄哲学和玄学又开始盛行。直到后来那两位印度僧人客死洛阳,佛教在中国大地也没掀起多大动静来。

倒是汉末和晋末的社会环境给佛教东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那时社会实在太混乱了,特别是东汉桓灵以后,外戚宦官争权不断,黄巾起兵,董卓之变,三国纷争,晋得天下,旋即八王残杀,五胡乱华。在这么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动荡、旧有学术思想道德观念动摇、人心极端怀疑苦闷的时代,最容易激发老百姓的宗教情绪,而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提倡和支持佛教的传播。中国的佛教也就是在汉末魏晋这个环境里,交织着道家老庄的思想,快速地滋长传播。

当时基本上以口口相传为主,信教者与传教者也不大能够明辨佛道之别,佛教徒又多以神异吸引信众,于是与流行的道教彼此混杂并且互相推演。其后百余年间,通过支谶、安清、竺佛朗、康孟祥、竺大力等人的译经,又有牟子讨论佛义的《理惑论》问世,佛教本身的意义渐次明朗,逐渐摆脱方术道士的阴影,开始独立起来。

其时的西晋王朝虽然历时只有半个世纪,但思想形态却为之一变,肯定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各种学派百家齐鸣。在这样的氛围下,佛教得到长足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据《洛阳伽蓝记·序》载“洛阳至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则称“西晋两京合寺一百二十所”。

那个时候的佛教活动仍然以译经为主,著名的佛教学者有12人,其中竺法护是西晋成就最大的佛经翻译家。

竺法护祖籍月支,世居敦煌,8岁出家。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带回长安。47年间译经150多部,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华严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这些佛典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的基本面貌,在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僧传·本传》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名士孙绰作《道贤论》把竺法护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山涛。

据说竺法护刚接触西域佛经时,也被里面曲折难懂的文字弄得一头雾水。后来,他专心凝神,心突然变成一泓潭水,深不见底,他就逐字逐句读完经典。从此以后不仅能够日诵万言,而且过目能解。

2.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部陷入了十六国的混战。混战归混战,佛教反倒更加普及了,并成了东晋十六国几个主要国家用以争取民众而共同支持的一种信仰,对于增进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起到了比儒学还重要的作用。

由于东晋朝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偏安南方的朝廷,版图有限,面对外族入侵又无能为力,不少历史学家对于把它作为独立的朝代写入中国史很有意见。但东晋还是有很多让人尊敬的地方:在一百余年不长的历史上,曾有四大家族组织过北伐;在北方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同时开发了南方并为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所在;东晋又是个文化昌盛的朝代,随便数数就有顾恺之、陶渊明、谢灵运、王羲之、郭象、道安、慧远等流传千古的名人。

后两位是佛教界的高僧。在北方十六国中,影响最大的僧侣应该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佛图澄,有人称其为西域妖僧。他在古印度求学佛法时,同时捎带学会了许多幻技方术,也就是现在的魔术。公元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不久,就被引见给后赵皇帝石勒。石勒听不懂佛图澄所说的佛学道理,干脆问他:佛家有没有灵验的东西让我心服口服?

佛图澄说有啊,随即取过一个小碗,碗里盛满清水,然后他边烧香念咒,边手舞足蹈,不久水纹荡起,从碗里竟长出一朵光彩夺目的青莲花。石勒折服得五体投地,当即封佛图澄为“大和尚”。佛图澄从此得以在后赵国内普传佛法,并在石勒的支持下广建寺院893所。

许多佛教的典籍都记载他的“神迹”,用崇敬的笔调把这位高僧妖魔化了。其实,佛图澄的佛学造诣非常高,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经常舌战群儒,对答如流。许多僧人不远万里来听他讲学,或者干脆拜他为师,比如道安。



道安在遇到佛图澄之前因形貌黑丑在原来的寺院专做粗活,得到佛图澄嫡传后进步神速,而且经常代表师父外出弘法,解答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当时有“漆道人,惊四邻”的说法。

道安在戒、定、慧方面的成就很高,但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襄阳制订出了中国第一部僧侣规范,里面有行香定坐上经开讲之法。六时行道饮食之法以及布萨差使悔过之法等等,并第一次提出所有佛教徒都应以释为姓。在这以前,佛教徒都是以老师的籍贯为姓,老师是天竺人,就姓竺。道安这个以释为姓的规定一直沿袭到现在。

道安在当时的名气实在太太,以至于同样笃信佛教的北方前秦大帝苻坚在淝水战役前不惜专门安排一次襄阳战役,战略目标的重点就是抢夺道安北上。道安被劫持到长安后,住持了几千人的大道场,成为北方的佛界领袖。

苻坚劫持了道安以后,还想再劫持一个人,那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与佛图澄是同乡,也是西域龟兹人。父亲原是天竺高僧,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他7岁就随母出家,二十几岁时已在西域享有盛名。据说当年西域各国的国王请鸠摩罗什去讲学,都要亲自跪在罗什将要落坐的宝座前,由罗什踩着国王们的背登上宝座,和尚做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苻坚最终没来得及与心仪的偶像见上一面就仙逝了。鸠摩罗什又被后凉国王吕光劫持并监禁了19年,其间吕光用酒把鸠摩罗什灌醉,迫使其与龟兹国公主破戒成亲。直到后凉灭亡,鸠摩罗什被后秦新主姚兴迎进都城长安,开始在中原华夏设坛讲座。

鸠摩罗什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法华》、《维摩》、《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等论,共74部,384卷。佛教成实宗、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时称“四圣”。当时南方东晋的佛教界领袖,也就是净土宗创始人慧远因为战争和交通的原因不能当面探讨佛理,就通过信函求教。那个时期的鸠摩罗什完全是个超级高僧或者说是佛学权威,后人评价他对于中国佛教所起到的启蒙作用,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3. 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经广泛普及,到了南北朝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这个时代不仅疆土分裂,佛教也走向了两个极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和史无前例的崇佛皇帝都凑在一起了。

北魏太武帝刚即位时也是推崇佛教的,但此时佛教寺院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许多寺院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方式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富可敌国。这些寺院不用交税,僧侣也不用劳动,更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检点约束,经常越点小轨。刚好武帝身边有两个名叫崔浩和寇谦之的大臣都信道教,三天两头在武帝面前非议佛教。他俩对太武帝说,我们身为华夏子孙,应该信奉本土的道教,怎么能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呢?太武帝觉得很有道理,加上打仗需要钱粮,总想找个机会向寺院伸手。

机会说来就来。公元445年,关中盖吴起义。关中过去是后秦的首都,后秦统治者姚兴崇信佛教,这个地区的佛法非常兴盛。估计有不少贫穷佛教徒都参加了这次起义,当太武帝在长安寺庙中查出许多弓矢和矛盾时,勃然大怒,马上发起灭佛运动。

首先下令全国的王公百姓不得再向僧侣施舍钱物。切断了寺院的经济命脉以后,太武帝发布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僧”的绝杀令,在全国范围内捕杀佛教徒,焚毁佛经佛像,一时间香炉灰飞烟灭,可怜成千上万的僧侣因信仰而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佛教在中国传播到第四个百年就遇到了如此大的劫难,是佛教徒们始料不及的,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以后像这样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还发生过多次。

后来的情况有些神乎其神,拿佛教的话说是因果报应。灭佛后不久,寇谦之很快病死,崔浩因撰写《魏史》被怀疑蔑视胡族而被太武帝腰斩,武帝本人则在灭佛六年后被一个惹事的宦官用绳子勒死。

由于太武帝的儿子们被武帝自己杀得差不多了,就由孙子继任皇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继位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佛教徒们平反。大概考虑到自己的皇爷爷造孽实在太多,光





是为死去的佛教徒开开追悼会还不够,就下令在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西郊的山上开凿石窟并雕刻佛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同云冈石窟。

南朝的梁武帝本是个多才多艺、知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出类拔萃,执政前期,把整个南方治理得国富民安,天下太平。和北魏太武帝相反,他最初是信奉道教的,就连重大的国家大事都向茅山道士陶弘景请教,后来大概吃多了道士的丹丸不见成效,决定抛弃道教,改信佛教。

改信就改信呗,谁知梁武帝信了佛教后就到了痴迷的程度。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广建佛寺,大塑佛像,并敕造了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 11 座著名寺院。当时南朝半壁江山有寺院 2846 所,出家僧尼 82 万人,唐代杜牧在《江南春》绝句里写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只是京城建康一带的寺院数字。

梁武帝自从信了佛教后,就带头遵守佛教的戒律,吃素斋、戒酒肉、绝房事,后来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居然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奴,但国不能一日无君,大臣们只得从国库拿出巨资为他赎身。

除了接二连三地舍身外,他还积极从事佛学理论研究,撰写了许多文章,据说都非常专业,可惜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当然也有流传至今的东西,著名的“梁皇忏”就是梁武帝发明的。梁武帝写了文章以后就想让大众知道自己的佛学观点,于是隔三差五地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中大通元年(529),他开设四部无遮大会,也就是僧尼以及男女居士都可参加的弘法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余人。

可惜的是,梁武帝这些举动最终换来的却是天下大乱。太清三年(549),侯景叛乱的军士们将梁武帝围困在官内的佛像前活活饿死,结局有些出人意外。

但不管怎么说,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像中国佛教徒不许吃肉就是他规定的。在这之前印度佛教实行的是乞僧制,只要是乞讨来的食物,即使里面有肉,也要不加选择地吃下。梁武帝认为既然佛规不准杀生,那么和尚吃肉就是助长百姓去杀生,就诏令天下僧侣不许肉食,形成了出家僧尼一律素食的传统。这些戒律不仅有利于僧团的管理,更突出了

佛教慈悲仁爱的特性,所以沿袭至今。

4. 回过头来再说鄞州。《鄞县通志》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鄞县的文化尚处于草昧时代,宗教却领先于文化而捷足先登。这个捷足先登并非没有缘故,是有扎实基础的。早在东汉建武年间就有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于现在江北费市的灵山,后舍宅为寺取名灵山寺,就是保国寺的前身。几十年后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僧人普定在现为北仑大碇的灵峰山结精舍设像行教。“设像行教”字面理解应该是挂着菩萨的画像向芸芸众生宣传佛法,但当时毕升及其印刷术还在“汤锅里浸着”呢,文字包括书画的流传大多使用竹简和木牍,虽然那时已经有人用细绢或棉纸写字作画,但只限于宫廷贵族内部,因为细绢和棉纸的价格昂贵得近似现在的裘皮,估计普定带来的佛像是刻在竹木上的,但不知敬的是哪位菩萨,传播的又是哪门宗派?后来好像也没有寺院名称的记载。

到了三国,整个浙东地区已有寺院十余所,其中宁波境内有记载的寺院为普济寺、五磊寺和吉祥寺,灵山寺和普定创建的无名精舍在这个时候似乎销声匿迹了。这很正常,因为佛教初传时期,大都是某位有理想追求的僧人单枪匹马孤军深入到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搭座简易的茅棚自行修炼并且自生自灭,也有后来发展成几间十几间上规模的,但经不起接二连三的火灾水淹,说没就没了。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又有僧人或信徒在原来的废墟上兴建寺院,把这段历史给续上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都是沿着这样的脉络螺旋式前进的。

前进的步伐跨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在宁波平原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这时,并州离石人刘萨诃来了。

刘萨诃僧名慧达,原本是个双手沾满生灵鲜血的小军吏,后来在梦中经神灵点拨而皈依佛门。西晋太康三年(282)东游至鄞县乌石岙得佛舍利宝塔,于是结茅守护,成为阿育王寺的开山之始。

18年后,在距阿育王寺不到15公里的鄞县东谷,僧人义兴也在那里结茅修持,创立了天童寺。两寺创立的年代都在西晋,相隔只有18年,相距也只有十几里,但在交通和信息闭塞的古代,两位名刹的创始者真正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